

## 打开清华向中国核试验基地 人才输送的大门

○周新嵩（1964工物）



周新嵩学长在母校留影

2013年，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迎来了建所五十周年的庆典。在五十年中，清华人为基地的建设与壮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近日，应校友总会钱锡康老师之邀叙谈了一些在基地清华校友的情况。在这五十年中，我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承担了基地与母校的联络工作，可以说在此期间，我为核基地敲开了清华人才资源的大门，又为清华占领了核基地人才使用的平台。

### 从清华园到戈壁滩

1958年我从上海速中（现上海交大附中）保送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两年后转入工程物理系210—1核电子学专业，

1964年毕业于。

在校学习期间，我曾担任过无线电系体协副主席（主席是胡大炘），校学生会生活部副部长和国防体育摩托运动队队长。在担任摩托队长期间，我曾多次驾车与队友在圆明园的废墟上进行越野训练，每次都仿佛看到圆明园熊熊的烈火在燃烧。从此，促使我萌发出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投身国防报效国家！绝不能让英法联军的暴行再在祖国母亲怀抱中重演！因此，大学毕业时，我婉拒了何介人同志让我留校任教的好意，毅然决然地要求到国防单位去从事国防科研事业。因而，毕业分配中我只选了“国防科委（即现总装备部）”一个志愿，其他志愿栏都是“服从分配”。

1964年是核基地大量接收科技干部的第二年，当年我和各系毕业生有30多人一起分到了21所（即中国核试验基地研究所），记得工物系有6人是：梁昌靖、马新泰、马占波、张延龄、刘旭东和我。其他系还有王心正、王力殊、李艳茂……我们一起到了通县保安胡同一号，这是当年袁世凯屯兵小站的“八卦粮仓”。这就是初创时的核基地研究所，在这里我们进行了三个月军训，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特大新闻传到了通县军营，大院里一片欢腾，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直到这时我们才得知，原来21所就是直接从事核试验研究的研究所。我为能参加到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我是学实验核物理专业的。1965年，参加“四清”后，所里把我分配到陆祖荫主任和杨裕生副主任领导下的第三研究室放化分析组搞核物理测量。该室当年正在和中科院原子能所（401所）协作，我们一边学习一边研究核爆炸样品的放化分析技术，并参加核试验任务。我就在北京的401所与新疆核试验基地来回跑。“文革”开始后，北京的政治生活受到干扰，1967年国防科委下令21所全部搬迁到了新疆。之后我曾先后参加了1965年5月14日第一次飞机空投原子弹试验，1966年10月27日第一次核导弹试验，1967年6月17



周新嵩学长在基地

日第一次氢弹空投试验，1969年9月23日地下平洞核试验。

“文革”继续发展，风云突变，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突然改变了21所许多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命运。1969年11月，军宣队一纸命令宣布：“周新嵩等252名军人退出现役，复员地方工作”。哪里来就回哪里去，我就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部队处理了，复员到了北京，在一个街道小厂当了一名二级工。

在那史无前例的特殊年代，政治生命高于肉体生命。尽管戈壁滩的环境和生活是那么艰苦，但是核基地的广大科技人员宁愿吃苦，也不愿选择离开。事后我了解到，在从事“两弹一星”的科研人员中蒙冤者何止数百人呐，包括九院在内全国有成千上万人。这是国家的一场悲剧！对那些年的不公平待遇，我耿耿于怀。我一个童工出身的国家培养的大学生是光荣参军入伍的，但却莫名其妙地被部队清理出来，灰溜溜地回到地方上，觉得是不光彩的事。我一直在渴望有还我公道、还我光荣、还我军人身份的那一天。

### 重返蘑菇云升起的地方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曾被打倒的张爱萍上将重新当上了国防科委主任。由于“文革”，科研人员十年断代的情况，基地突出的矛盾是人才匮乏。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拨乱反正，为在“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他重新工作后，首先就来到了新疆核试验基地，看望科技干部，并十分动情地对基地干部说：“我们要把那些被赶走的同志请回来！”

## □ 我与清华

命运再次向我敞开了幸运之门。杨裕生主任、钱绍钧副主任动员我重返部队，所里很多同志也都热情地欢迎我回去。此时我在北京的工厂已干了9个年头，当时我所在的电视配件三厂已内定我为厂长兼总工程师的人选。但是部队又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我终于下定决心：回去！

当时基地研究所拟定了一个回收科技干部的80人名单，而最后真正落实归队的只有七个人。不少人对我的二次入伍很不理解：“老周，你是不是疯了？部队给了你什么好处？”“老周，你放着技术科长不当，放着日本松下公司的考察不去，还扔掉了金不换的北京户口，图什么呀？”

我的回答是：首先，我认为自己在地方上搞产品生产和技术管理远没有搞尖端武器、增强国防实力重要；其次是自己的专业对口，学有所用，那里才是最需要我的地方，我必须珍惜这次机会。但是地方单位并不想让我就这样走了，他们用“集体所有制生产也是党的事业”等大帽子来压我。另外我也意识到回部队去搞国防，也是一个军人的无上荣誉，我不能就这样被扫地出门。我爱人也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她宁可承担起独自照看两个孩子生活的困难，全力支持我归队，实现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因此，我同意了部队商调

函的条件，服从祖国的需要，回到核试验场去，再为国防事业立新功。

经原单位上报国防科委后，经军委主席邓小平批准，我如愿以偿得以二次入伍。1979年初，我又回到了蘑菇云升起的那一片热土，仍然是承担放化分析任务，直到1994年提前病退为止。

### 打开清华向21所输送人才的大门

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残酷迫害科技干部，加上大学十年停课造成了人才的断代，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科技干部匮乏的现象，艰苦边疆部队更是严重。80年代初，尚属计划分配，21所还能分到几个毕业生，1983年后，国家对毕业生分配工作进行改革试点，开始实行双向选择，就没有人愿意到艰苦的戈壁荒原去了。



1994年10月，为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30周年，学校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21基地部分校友返校与学校部分同志合影。左起刘国治、董福禄、王晶宇、范如玉、叶立润、陈希、陈达、周新嵩

核试验马兰基地自开创以来就是清华学子施展才能的大舞台，几十年来一批又一批的清华学子来到基地建功立业。基地初创时作为技术骨干调入的就有：孙瑞蕃（1943，西南联大，航空）、董寿莘（1940航空，已故）、陆祖荫（1946物理，已故），而解放后毕业的校友有钱绍钧（1951入学物理）、黄豹（1959电机，已故）、倪源兴（1961工物，已故）、孟雅（1960无线电）、金咸安（1961工程热物理）、刘镇球（1961工程热物理）等。

1963年是基地大规模接收地方大学毕业生的第一年，当年输送到核基地的有：陈达、孙亚今、连环球、房士良、张鸿欣、张志诚等（以上为工物），袁光钰、徐继彰、徐进（以上为工化），龙守湛、顾庆中（自控）贺成功（无线电）等17人。而1964年一届基地接收的毕业生已多达三十多人。

可见，在“文革”前后就有很多毕业生参与核试验，都是各领域的技术骨干，他们为“两弹一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基地已获得将军军衔的就有钱绍钧、叶立润、黄豹、陈达、朱凤蓉、张利兴、范如玉、王洪、王群书、刘国治。

如今，双向选择的结果是没有人愿意选择去荒漠的戈壁滩了。

1984年，我的领导杨裕生主任升任基地研究所所长，

深深感到他的压力来自技术人员的缺乏，他心急如焚，急切盼望人才。他历来就很重视名校人才效应，虽受“文革”中批判，也坚决不改。他在实践中感到，清华的学生基础好、悟性高、一点就通、有创造性、有独立工作能力。于是他想出一招，把我推到了去名校要人的第一线。他首先让我回到清华大学去动员物色毕业生招聘到核基地工作，继而扩大到北京其他名校。

1984年是我“文革”以后第一次回到清华来要毕业生，当时我手持国防科委大红印章的介绍信，来到了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办，当时管接待工作的老师看了看介绍信后，一挥手就告诉我：你回去等消息吧！此后便杳无音讯了。1985年，我再一次迈进清华大门，参加学校的毕业生供需见面会。这一次正在北京出差的杨裕生所长下令：凡在北京出差的清华校友无条件返校参加招聘会，一起去宣传核试验基地，争取有毕业生到基地工作。



21 基地领导来清华洽谈人才培养合作，与清华大学领导及有关院系同志合影。前右2、4分别为王大中校长、方惠坚书记。前左2为周新高



## □ 我与清华

这次到学校，我遇见了老学长、校友会承宪康和校学生处处长赵燕秦学长。我和承宪康在校学习时就熟悉，他是我在体育代表队时的支部书记。赵学长是文艺社团的团长，住三号楼，体育代表队住四号楼。这一下就把距离拉近了，我实事求是地把我们来学校要毕业生的要求告诉他们，并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核试验基地急需人才的情况。他们对此非常支持，此后每次来我都得到他们热忱的帮助。赵燕秦认为：对你们这样国防重点单位应该从政策上予以保障，要给予倾斜，要给予方便。后经请示校领导后，她为我们基地制定了一项特殊政策，按以往规定一般是不允许用人单位与毕业生直接见面的，但是对我们可以例外，允许我们直接和学生见面，可以到学生宿舍走访找学生谈心。她说只要你们宣传得当，有学生愿意去基地工作，可以不受定额的限制，有多少人愿意去，我们都给你们。工程物理系管学生工作的戚群力、高宝英老师，物理系朱赤老师，电子系张英香老师一经联系都特别支持，主动动员学生，还向我们推荐学生。

那时候，我坚信清华是有着光荣传统的，总会有热血沸腾的学生去志愿从事国防事业，问题是宣传要到位，要把国家的需要、个人的前途讲清楚。我们就到学生宿舍去，和学生谈，讲21所是国家的重要部门，是有事业可干的，当然生活条件比大城市是艰苦的，我也不回避，给学生讲在那里怎么吃饭，怎么刮大风。我讲话底气很足，因为我都经历过，我明知那里生活很艰苦还二次归队重返戈壁滩，这本身就是个示范，所以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这一年就不空手，我争取到了清华7个毕业生到基地去。以后几乎年年来，从1985年到2005年，前后坚持了近20年。后来就不止在清华，也到北京别的学校去要人。前后争取到五六十个毕业生去基地工作，其中清华就有近20个，他们后来都成为基地和21所的骨干。如黑东炜（1987级工物）现任21所副所长，党海军（1984级化工）曾任第七研究室主任，现为七室研究员，阿景焯（1990级工物）现任基地科技处处长等。其中突出的一位是刘国治。刘国治到了21所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他从室副主任、主任，到21所副所长、所长，到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少将、院士，入选国家首批“百千万人才工程”，我国某国防科研领域的学科带头人。2009年调任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是全军最年轻的副大区级将军。我很感谢学校最高领导层的高瞻远瞩，高风亮节，没有从本位出发把刘国治留在学校，毅然拍板把刘国治输送给了部队。否则，现在可能就是清华多了一位教授，科学院也可以多一位年轻的院士，但是共和国的天空将失去一颗璀璨的将星。

此时，不禁使我想起范如玉学长（1966工物）在去美国之前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你能争取到一个好的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讲比你完成一项重要课题更有价值。”

二十年来，正是出于对国防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我在做好本职科研工作的同时，打开了清华大学向21所输送人才的大门。现在，学校和基地的关系向纵深发展，已形成骨肉相联的双边关系。我为核试验基地技术干部队伍建设，为母校的人才培养做了一点贡献，感到十分欣慰。